

巍巍祁连见证85载倾情守护

——甘肃省张掖市陈宗新一家接续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故事

一座墓,300余位红军官兵,壮烈牺牲感动天地;四代人,85载春秋岁月,默默坚守无怨无悔。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龙渠乡村民陈德宝、陈榆林、陈宗新、陈梦雪一家四代接续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故事,在巍巍祁连山广为传颂。

8月1日清晨,58岁的村民陈宗新带着女儿陈梦雪,来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龙渠烈士陵园扫墓,祭拜安葬在这里的红军烈士。这样的守护,陈宗新一家四代已坚持了85年。

走进陵园,青砖地面干净整洁,四周松柏郁郁葱葱,正中央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碑上“红西路军烈士永垂不朽”10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一束束鲜花整齐摆放在碑前。

紧挨着陵园有一个独立的农家小院,是陈宗新的家。陈宗新拿出一张有些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村民坐在一起听一位老人讲故事的情景。陈宗新介绍,照片上是自己的父亲陈榆林正在给村民讲西路军的故事,这也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照片。每逢重大节日,一家人总要拿出来看看,共同回忆父辈们那段熟悉而又遥远的往事。

“只要我活着,就一直守着你们”

1937年1月,红军西路军在甘州取得西洞堡大捷。一支300多人的队伍返回营地途经白城村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部的袭击。敌人人数众多、炮火猛烈,缺乏弹药的红军依托白城堡英勇还击。战至中午时分,红军弹药殆尽。因寡不敌众,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倒在血泊中。

等到枪声彻底停止后,村民才胆战心惊地走出家门。看到村口四处躺着红军战士的尸体,大家悲痛不已。已年近半百的村民陈德宝来到村头,望着惨烈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和红军官兵朝夕相处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宁愿穿着单衣薄裤靠着墙角睡觉也不打扰村民……

陈德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亲眼目睹马步芳部队像土匪一样欺压百姓,到处烧杀抢掠,更加拥护一心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和红军。怀着对红军的崇敬之心,陈德宝发动村民一起收殓红军遗体。他们在村外一处空地挖了一个很大的墓穴,将烈士们的遗体合葬在一起。从此,村里就有了这座红军墓。

在清理红军遗体时,陈德宝发现有两名红军战士还有微弱心跳,看上去只



▲陈宗新擦拭墓碑。
▲陈宗新为烈士献花。

有十六七岁的样子。陈德宝冒着生命危险,把两名红军战士背到村子南面一处靠山的土窑里藏了起来,并安排妻子偷偷给红军战士送饭。

不久,陈德宝营救红军战士的事被当地民团发现,凶狠的团丁把他抓去严刑拷打。后来,在好心人营救下,陈德宝逃了出来。“听爷爷讲,两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是南方口音,虽然身体瘦小,但很坚强。两名红军战士没有逃过敌人的搜捕,被扔进冰窟窿淹死了。爷爷为此伤心了好长时间,一提起马匪就恨得咬牙切齿。”陈宗新说。

“只要我活着,就一直守着你们。将来我不在了,我的儿子、孙子守护你们。”站在烈士墓前,陈德宝老人默默许下诺言。

“再苦再难,都要守护好红军墓”

1952年,陈德宝去世了。临终前,他向儿子陈榆林郑重交代:“这座墓里埋着红军烈士,他们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牺牲的,都是好人。你要记着,再苦再难,都要守护好红军墓。”

从那以后,陈榆林牢记父亲的遗言,成为第二代守墓人。次年,为方便守墓,陈榆林把家搬到红军墓旁一个独立的院落。看着他们一家孤零零地住在那里,亲戚都劝他们搬到居民点去。陈榆林说:“这儿离烈士墓地近,方便守护。”几十年来,陈榆林一家一直住在那里,几次

翻修房屋都没有搬迁。

“1965年,我嫁到白城村时,陈家就住在远离居民点的院子。不论冬夏,不管闲忙,陈老汉每天都去陵园打扫卫生,清理杂草。陵园在他的看护下,没有受到一点损坏。我们也讲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他们一家人做的是修行积德的好事。”75岁的村民王桂花说。

1970年,当地开展平田整地行动。心急如焚的陈榆林赶到当时的龙渠人民公社,向公社领导汇报情况。公社领导很重视,发动村民重新整修红军墓,并在四周用砖头砌上围墙,种植杨树和松柏。陈榆林在墓前立了一块木碑,用毛笔写上“红军烈士之墓”。“当时我才8岁,刚上小学,学校还发动我们背砖用来修墓。”陈宗新回忆。

有一年,村民取沙土垫地蔓延至红军烈士墓周围。为防止烈士墓遭到损坏,陈榆林劝村民:“墓里埋葬的是革命先烈,他们为了我们过上幸福日子牺牲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决不能破坏烈士的墓地。”听了陈榆林的劝说,村民再也不到这里挖沙取土。

2002年,陈榆林去世后,守护红军墓的任务便落到儿子陈宗新肩上。陈宗新说:“自我记事起,每逢清明、春节等重大节日,父亲都会带着我们先来祭扫红军墓,再去祭拜自家祖坟。”在他们一家的宣传带动下,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经常自发前来扫墓。

“讲好烈士故事,弘扬英烈精神”

清扫坟墓、种植植树、浇水修枝、清理杂草、擦拭墓碑……几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定期到烈士陵园祭拜长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已成为陈宗新生活中重要的一件事。随着对红军战斗历程了解的深入,陈宗新对英烈的尊重和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不能只是打扫卫生,还要给群众讲述烈士的故事,弘扬英烈精神。”多年来,父亲的嘱托一直在陈宗新的脑海回响。为弘扬革命烈士精神,只有初中学历的陈宗新到当地革命纪念馆学习英烈事迹材料,主动为前来烈士陵园祭扫的干部群众和师生讲红军艰苦奋斗、英勇奋战的感人故事。

2021年6月的一天,来自兰州的一批游客瞻仰烈士陵园,陈宗新负责讲

编后——

守护的是精神丰碑

许诺、践诺,子承父愿,四代相传,一守就是85载。8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对一个家庭而言,却是十分漫长。多年来,无论地里的农活多忙,无论家里的事情再多,陈宗新和家人对陵园的保洁整理一天也没有耽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是烈士的墓地,更是革命先烈用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是不容磨灭的历史。

巍巍祁连护英灵,弱水无声鉴忠诚。西路军将士把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留在河西走廊,这里的人们也用实际行动呈现了尊崇英烈、爱戴英烈的朴素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融入血脉。

解。他用质朴的语言、深情的讲述感动了旅客。此后的一周,慕名而来的游客,两次点名请陈宗新讲解。

“这几年,党和政府对保护烈士墓的投入很大,十分重视红色教育,每年到这里祭奠烈士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一天来好几拨人。看我忙不过来,女儿陈梦雪主动加入,担任义务讲解员。”陈宗新说。

陈梦雪是陈家第四代守墓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她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并兼任龙渠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她讲解认真细致,流畅深情。因为她知道,她的每一句讲解都深深饱含着父辈沉甸甸的嘱托。

说起烈士陵园情况,陈梦雪如数家珍:“2005年,乡政府发动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对红军墓进行整修;2012年,政府又投资80多万元,对烈士墓进行修缮,建成占地近5000平方米的‘龙渠烈士陵园’。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门、围栏、纪念碑都是2012年修建的。”

陈梦雪打小跟着父亲为烈士扫墓,幼年时就在心里种下爱党爱国的种子。看着同龄人一个个跳出农门到城市工作,她也曾有过思想斗争,但她更清楚守护陵园不仅是父亲的期望,更是祖辈传承下来的重任。“去年3月以来,来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的人数大幅增加,一天下来虽然很忙、很累,但很充实。”陈梦雪说。

2021年,陈宗新被提名为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今年1月22日,陈宗新被评为2021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谈到今后的打算,陈宗新说:“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守护在这里。我们家会把西路军的故事一代代传下去,把不畏生死、敢于牺牲的西路军精神传下去。这是父辈的重托,也是光荣的使命。”

青山埋忠骨,热血照千秋。一座丰碑,见证了红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悲壮历程;一家四代,书写了尊崇英烈、爱戴英烈的动人篇章。

(摘自《中国国防报》文/李 栋 司李龙)

点燃理想信念之火

其实,当时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地的红军被敌人层层包围,弹药缺乏、粮草不济、困难重重。红军用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和少量“汉阳造”,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睡的是稻草床,因而有不少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一封著名长信,批判这种悲观思想,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文中豪情满怀,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然后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形容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不会熄灭。1936年,在陕北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坚定的革命信仰,加上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清醒认识,还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魄,打不垮的乐观主义精神,使毛泽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一定胜利,红旗一定能遍插五湖四海。

来之不易的“风展红旗如画”

浓郁的“红旗情结”

红旗,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毛泽东一生都具有浓郁的“红旗情结”,这在他的诗词里有着充分体现。仅在井冈山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诗词中就多次出现过“红旗”一词,“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这句:“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拼搏,几番奋斗。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按下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新中国的天空。此时此刻,举国同庆,四海沸腾,人民欢欣鼓舞,真是“风展红旗如画”。

为了这来之不易的“风展红旗如画”,无数仁人志士与革命先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拼搏奋斗、无私奉献,留下一幅幅令人难忘、气壮山河的历史画面——

井冈山上,红军官兵人人系着一条红色识别带,写着籍贯和名字,名曰“牺牲带”,代表他们随时为信仰而献身的决心。仅两年零四个月井冈山斗争中,就有4.8万余名英烈捐躯。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里,共产党员江竹筠和难友们一起,飞针走线,在红旗上精心绣下一颗大星、四颗小星。红旗光彩闪闪,金星熠熠夺目,照亮了黑暗的监狱,也照亮了每个难友的心。

1949年4月23日,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扯下了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了我军胜利的红旗。捷报传来,毛泽东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诗句。

旗帜就是阵地

浩瀚太空,一望无际。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在神舟五号飞船中展示五星红旗。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他手举五星红旗,频频挥舞,耀耀中华。

开山岛上,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守岛32年,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一次遇到12级台风,王继才为保护国旗,拼断两根肋骨。他毫不后悔地说:“旗帜就是阵地,人在旗帜在,旗在阵地在。”

一个个回回,一幕幕场景,动人心弦,感人肺腑,也催人奋进。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场以百年计的伟大征程上,有“风卷红旗过大关”的严峻考验,也有“红旗漫卷西风”的慷慨激昂。我们只有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闯关夺隘,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笃信实干,才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才能看到“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摘自《解放军报》文/陈鲁民)

靓丽的红色记忆

——一部由地下党员编印的诗集《诗与木刻》

石仲达(?—1971),原名石俊民,生于四川,中国共产党党员,喜诗文创作,1944年到贵州绥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在洋川小学、县民众教育馆从业,同时兼绥阳中学教师。曾担任中共绥阳特支宣传委员、中共绥阳县委宣传委员。1946年8月,因工作需要转移到重庆江北人和民众教育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重庆江北县委副书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党总支副书记等职。

1944年年初,石仲达受组织委派来到贵州绥阳。这年2月,石仲达与先期到达绥阳的地下党员温凯廷和张群英三人,在县城成立“中共绥阳特支”。温凯廷任书记,张群英任组织委员,石仲达任宣传委员。通过温凯廷的介绍,石仲达在洋川标小教书,不久还兼任了绥阳民

教馆的教导主任。

在民教馆,石仲达遇到了喜欢木刻的知识青年郑畸石。郑畸石是1944年从广西桂林逃难到贵州后到民教馆工作的。两人隔壁而居,经常一起讨论时势。石仲达知识广博,爱好文学,常写新诗,在诗中表达对时势的感慨,而郑也常用绘画的形式表现时局。相近的爱好和共同的观点,使二人萌生了刊印一本《诗与木刻》诗集的想法。经过充分准备,1944年5月,两人以民教馆的名义,刊印了一本《诗与木刻》。收录石仲达诗歌10首,郑畸石木刻画10幅,共发行200册,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诗与木刻》序言道出了编印诗集的目的:“抗战以来,作家们以笔报国,新艺术的各部门,都配合着时代而有惊人的进展。但在这偏僻的角落,文化活动似

乎还没有抽芽,开花结果,更无论矣。此时此地而《诗与木刻》出现,是有着‘拓荒’一样的作用,实在颇值得欣慰而推许的。”

诗集中第一首诗《新生代》,配图中一个少年手中高举燃烧的火炬,表达了作者对培养新生代的渴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诗《播种者》,配图中心一位教师左手举着教材给学生讲课,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该书,播下革命种子们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这簇刚从希望的种子/新抽出的幼芽/虽然在他们的形色/沾染着苍光和病状/但他们却都有一颗/比青年还年轻的心……/我祝福这些辛勤耕种的播种者/他们为‘抗战’丰收了谷米。”

石仲达和郑畸石经常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诗《插秧》,配着一

幅农民在稻田里插秧的图画,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主题。诗中写道,“四月的田野/一片生命的绿色里/无数灰色的背影/起伏在荡漾的银波上/安排无数的生命于适当的地方//秧在手里/歌在喉头/脚在水田里抵起金色的泥流。”

诗《逃亡》,配着一幅让人惊心动魄的逃亡图。诗《轰炸后》,配着同胞因轰炸而死亡的图画。画面中,祖国的田园和村庄被日寇的炸弹燃烧起漫天烽火,烈焰腾空,难民们在一片火海中逃亡。作者显然是为了号召人们为了自由而起来反抗,前进。诗中写道:“残缺了的墙垣和露台/是他们旅途上的宿营地/在炮火里失掉了家园/终于驮负着苦难的命运/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行进/行进/在祖国的土地上/向着自由/向着光。”

诗集的最后一首诗《到前线去》,配

中央苏区时期党如何为群众谋利益

中央苏区时期,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所在。因此,取得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的贫苦工农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强调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好工农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工作中都彰显了为群众谋利益的生动实践。

政权建设保障人民权力

政权建设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探索中最重要的方面,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是其他权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最高行政机关是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苏区时期共建立省级苏维埃政权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19个。苏维埃政权的广泛建立,为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提供了强大政治支撑。

在中央苏区时期,政权建设广泛而牢固的原因在于赋予了每个人基本的政治权力并使民主选举意识深入人心。《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之男女而非从事剥削的劳动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使得苏区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了最真实、最广泛的政治权力。但是,由于长期遭受封建思想统治和压迫,普通群众几乎没有民主参政的权力意识,对民主选举的意义也茫然无知。为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宣传工作,使中央苏区的选举工作深入到了乡村基层之中。广大劳动群众通过行使选举权来参与并主导自身权益的保障,这与乡村以往依靠宗族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截然不同,使群众实现了历史性的翻身做主。在中央苏区后期,选举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经济建设增加人民收入

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确保人民的生存根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土地革命之前农村土地分

配极不合理,广大农民长期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了将广大苏区农民从残酷的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使中国农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也使得党和苏维埃政府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

土地问题解决之后,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劳动力、耕牛、肥料、种子、资金等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为此,苏维埃政府本着群众自愿的原则,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生产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充分利用了农村的生产资源,给农民带来了极大便利,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实际困难。毛泽东、邓子恢等领导的亲自提倡和大力推广促进了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改善农民群众贫困生活、冲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巩固工农革命联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重

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围绕卫生防疫、社会救济、文化教育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增进了人民福祉。

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增强了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不是单单靠着少数政府人员去做的,而是主要依靠群众的参与。为了将群众彻底动员起来参加卫生防疫运动,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先是利用报刊、标语、群众大会等方式进行通俗易懂的宣传,然后在群众间开展大规模、高频率的卫生竞赛,同时还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每月两次的“卫生运动日”,并且瞄准党员干部、在校学生、家庭妇女等“关键人群”进行专题卫生知识辅导。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巧妙地运用了群众的力量,使其卫生防疫状况得到改善,保障了群众的身体健康。

进行社会救济确保了穷苦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政府虽然经费不足,但仍然不

遗余力地救助困难群众。为破解社会救济所需的资金和物资匮乏难题,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广泛组织成立互济会,引导贫民在会内互帮互助,共同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大力发动群众进行募捐,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和动员下,群众踊跃加入“临时募捐”和“沿途募捐”的行列。中央苏区时期,面临经费不足的战争环境,党和苏维埃政府仍然想方设法开展对困难群众的救济,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直观体现。

普及知识提升了群众综合素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大量建立列宁小学、各种夜校、俱乐部、识字班等组织和团体全方位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广大苏区群众既获得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又加深了对党的革命路线的认同和拥护。同时,在中央苏区各地还广泛成立歌咏队、业余文化俱乐部等文化团体,活跃并丰富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生活。

(摘自《学习时报》文/朱一华 黄鹰西)